

## 侨易学与国际政治

赵 晨

时间进入 21 世纪的第 2 个十年后，伴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上升，中国国际政治研究诞生了一批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同过去 30 年所引进的西学相结合，独立而有创意的新思想。这批新思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打破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以理性为出发点的原始假设，给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概念注入了中国思维，比如赵汀阳的天下体系是站在世界的高度思考最优的制度设计，将中国周朝的政治架构设为模板，<sup>[1]</sup> 秦亚青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强调关系，而不是个体，思想来源是中国的儒学，儒学正是以关系为起点的政治哲学。<sup>[2]</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叶隽研究员在文学和学术交流史研究基础上提出的侨易学概念，其中的易体现了中国传统处理问题之道，侨又包涵丰富的国际关系交往内容。侨易学中的由侨致易、二元三维论述，都涉及国际政治，或者说外交决策，给理性国际关系理论增加了交往移情的动力，以及利益驱动和无我逍遥之间的中观层次。本文即尝试着归纳侨易学在国际关系理论谱系的位置，并以案例说明它能给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新视角，对其意义进行初步阐发。

### 国际政治中的由侨致易

政治学是有关决策的学说，《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制度卷）将政治定义为“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和将其付诸实施的活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思想卷）将政治简要地定义为“一群在观点或利益方面本来很不

[1]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2]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

一致的人们作出集体决策的过程，这些决策一般被认为对这个群体具有约束力，并作为公共政策加以实施”。<sup>[1]</sup>国际政治将决策的“容器”，即上述共同体扩展到国际领域，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还是关注国家间的博弈与合作。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重“力”，即国家实力高低导致决策结果向谁倾斜，自由主义重“利”，看重经济利益。英国学派强调“理”，坚持是否具有合法性会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侨易学提出由侨致易，强调观念变化与物质或精神位移的因果联系，“人的重要观念的形成，总是与其物质位移、精神位移息息相关，尤其是通过异质性（文化）的启迪和刺激，提供了创造性思想的产生可能”。<sup>[2]</sup>这与欧美国际关系理论 90 年代之后发生“社会学转向”之后产生的第三种主流理论——建构主义——比较像，都强调“情”，都重视决策者的观念和心理状态对决策的作用。但它们之间也有区别，侨易是一种动态过程，交往、物质或精神的位移是因，观念的变化是果。美国的建构主义理论主要是静态的，比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英美因为历史、血缘亲情，共同信仰自由民主制度，所以处在一种康德式的友好政治文化中；<sup>[3]</sup>玛莎·费丽莫（Matha Finnemore）提出“移情”（empathy）模式，就是指行动者纯粹为他国的利益而关注其福祉，即使这样做对本国物质利益和安全没有益处，例如，富裕国家的许多公共和私人机构为灾民提供的救济，或是大量的对外援助就属于这种情形。<sup>[4]</sup>欧洲的建构主义理论是动态的，他们将语言哲学应用于国际政治研究，强调语言的建构作用，认为话语是世界政治分析的基本单位。但很多欧洲建构主义理论过于相信福柯的“知识即权力”理念，在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互动中（包括欧美关系），过于重视“规范”从欧洲向外的单向输出。<sup>[5]</sup>侨易学更注重个体在发生位移之后的精神质变，如果应用在国际政治学之中，就是决策者的思想发生了改变，主体是这位决策者，他既是外来思想和情境变化的受动者，同时自身也主观能动地变化，其思想变化是主客观共

[1]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中译本主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631页。

[2]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3]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 Ma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98, p.898.

[5] 最突出的是欧洲学者进行了大量关于中东欧国家如何接受欧盟规范的研究，这被称为“欧洲化”（Europeanization）。如 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Community Trap: Liberal Norms, Rhetorical Actions and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1, 2001, pp. 47-80; 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EU, NATO,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03-208. 2012. Thomas Risse and TanjaBoerzel, "From Europeanization to Diffusion", *Special Issue of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5 (1), 2012.

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进程是双向，而非单向的。

关于由侨致易的原因和动机，叶隽没有摒弃权力和利益因素，他强调的是受动者的自觉与自省。笔者理解这里的自觉与自省，既可能是因为“变易”会带给自己物质利益，也认为是他或她经过自主的思考，其观念真正发生了变化。<sup>[1]</sup>同样是有关交往和协商的理论，但侨易论同于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的交往沟通理论不同，交往沟通理论秉持“协商逻辑”（logic of arguing），该逻辑是一个“求真”（truth seeking）的过程，参与者互相讨论、辩驳，为的是寻求理性基础之上的真相，哈贝马斯认为由于真只有一个，所以自然可以达成共识。在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对话情景”（ideal-speech-situation）中，人们具有一定程度的“移情”（empathy）能力，每个人可以理解其他参与者的愿望和需要，从自己之外的角度思考问题。<sup>[2]</sup>侨易的逻辑与欧洲一些建构主义学者提出的“说辞理论”（rhetoric theory）也不一样，说辞理论认为交往和协商只是一种参与者用来牟取自己利益的战略手段，“在一个共同体环境中，政治就是对合法性的争夺，而且这种斗争就是比拼各自的说辞”。<sup>[3]</sup>协商参与者可能拒绝与对手讨论问题，不听他们的意见，拒绝对手平等加入辩论，粗鲁地打断讨论；甚至欺骗、误导、撒谎；会用一些地方价值观、归属感、经验，而不是理性去说服听众；可能不会认真注意对手的论说，不承认自己失败，有时候被迫作出一些技术性 or 策略性的让步。<sup>[4]</sup>总起来说，说辞理论重在“说服”（这里带有“软性”强制力），是从施动者自利角度出发的。叶隽运用其二元三维的理念，将侨易划为游戏和博弈，即“高层次的理想状态”和“低层次的现实处境”之间的客观存在，<sup>[5]</sup>所以可以说侨易是将自利和利他结合在一起的理论，在不同的情境和场域下，有时自利的思想成为主流，有时利他的思维占据上风。

侨易理论可以在国际政治中有很多可以应用的领域。一个政治结构中领导人是最重要的人物，他或她个人的侨易体验会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一国的政策走向。这方面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例如俄国的彼得大帝 1697—1698 年间穿梭访问荷兰、英国等当时先进的西欧国家，走访当地的工厂、学校、博物馆、军火库，从而意识到俄国的全方位落后，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改革进程。1978 年邓小平访问日本、1979 年访

[1] 比如叶隽在其书中引用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的说法：权力动机可以与更加合理、更加富有人情味的方式结合起来去处理问题。见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35 页。

[2] 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10.

[3] 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EU, NATO,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p. 208.

[4] *Ibid.*, p.204.

[5]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80 页。

问美国，乘坐新干线高铁、参观福特汽车公司流水线等实地体验，改变了他个人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教条的意识形态认知，进而帮助他下定决心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 2006 年访华，在访问过程中，她了解到中德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促使她改变了就任初期激进的对华外交政策（比如会见达赖喇嘛）。

当然领导人也不可能垄断每项政治决定，各级别官员、专家、企业界人士，乃至利益群体代表等等都会在不同阶段参加决策进程。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经济全球化，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各类决策者与来自不同地域的其他人晤面的次数增多，特别是在同行或业务伙伴之间，这种密集会面给参与者带来情感上的影响。目前发达国家间已存在首脑、财长、央行行长们定期会晤形成的网络，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官员长期跨国合作形成的网络，甚至欧美国家间的法官们、议员们也已形成一个网络。<sup>[1]</sup>他们互通信息，介绍本国情况，探讨治理国家或本领域的问题，渐渐就形成了一种共同体意识，心理和道德标准上逐渐趋同，在处理问题时，往往可以超越国家和部门属性，站在共同甚至是对方的立场上思考解决方案。在欧洲，由于一体化程度较高，很多国家的部长们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开会碰面的次数甚至会超过他们与自己本国国内其他部部长相遇的次数。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这种状况会让他们不知不觉拥有了一种欧洲意识，会站在欧洲整体立场上看待世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也有类似的（只是程度深浅不同）的个体体验，他们参加联合国、二十国集团、达沃斯论坛等全球性以及各种区域性或专门领域的国际会议，既把自己的国内认知和具体情况带给其他与会者，也把其他地区的观念和思路带回国内，思想和体验都会发生变化，自然而然出现了易。

## 国际政治中的“易”

上述所谈之易主要阐述的是“变易”，侨易学中还有“一易”，是从中国古代经典《易经》里化用出来的，以易的精神指导人以更智慧的方式来应对因位移而产生的心理问题。《易经》是在对过去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抽象而成的，可用来指导人们更好生存、生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哲学道理。它是人们乃至组织和国家的一种行为准则，以它为指导，可以促进自身的进步，同时确保与周边团体实现相对的和平相处，如果大家皆行此道，则可实现世界的和谐。《易》最重要的启示是对“度”的

---

[1] [美] 安妮-玛丽·斯劳特：《世界新秩序》，任晓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把握，指各主体自觉地注意“过犹不及”，顺势利导，因时而为，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乾卦的“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和“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就对各个时段的扬与抑，进与藏做出了标示，人生和事业不可能一路高歌猛进，掌握住“度”，当时机成熟，准备完善时才可积极进取，这对个人、组织和国家是同样适用的。<sup>[1]</sup>

此“一易”在国际政治中，要求外交决策者有充分的自我认知，对外界环境有充分的感应，张弛有度，顺势而为，逆势则藏。可以以1991年和2003年美国发动的两次海湾战争为例：1991年由于伊拉克入侵并吞并科威特，美国总统老布什领导国际联军，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之下，为恢复科威特的领土完整，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发动空中和地面的军事进攻。当时美国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西方盟友、阿拉伯世界的普遍支持，组成一支包括34国的多国联军。苏联——这个冷战主导者，也没有反对。美国决策者经过互动发现，发动这场战争的国际外部条件比较成熟。在结束战争方面，老布什也很有自制力，经过100个小时的地面战斗，在伊拉克军队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情况下，由于萨达姆接受了联合国安理会第660号决议，表示愿意从科威特撤军，再加上苏联从中调解，老布什决定停止军事行动，没有发兵巴格达，彻底颠覆萨达姆政权。从国际社会角度看，这是一场相当正义的战争，美国也从中受益，不仅军费主要由沙特、日本等盟国出资分担，此战也一举奠定下它在中东地区的霸主地位。与之相对的是老布什儿子小布什，他在任职美国总统期间发动的，同样针对萨达姆的第2次海湾战争（现普遍称为伊拉克战争）。2003年的侨易场景则与1991年不同，小布什对伊动武的理由是怀疑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却拿不出确凿的证据；美国的立场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不仅中、俄反对，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盟友也公开站出来反对小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奥地利、瑞士和伊朗禁止联军战机飞越其领空，土耳其禁止美军通过其领土向伊拉克北部发动进攻，沙特阿拉伯禁止美军导弹通过其领空袭击伊拉克，而且美国惩罚萨达姆的方案也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这种状况下，小布什依然执意拼凑了一支志愿联盟对伊采取军事行动，结果是美国虽然很快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并将萨达姆本人送上绞刑架，但却使伊拉克陷入长期的动荡，也令美军长期陷入伊拉克这一“泥潭”。超过九千名美军丧生，5.6万人受伤，战争开支估计超过万亿美元。小布什不懂得势和度，盲目决策给伊拉克、美国和世界都酿造

[1] 赵晨：《侨易学在全球化研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2期。

了一场悲剧。

当然对势与度的把握是很难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觉》一书，就从政治心理学的微观角度分析指出，决策者经常出现错误知觉，比如会把对方想象成为一个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行为体；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程度；决策者从愿望思维出发做出判断；决策者会发生认知失调。<sup>[1]</sup>

但自觉地明白势与度又是极为重要的，否则政治决策就不可能在民主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的结果。如果完全没有妥协和易的思维，甚至连基本的合作都难以实现。美国经济学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于1951年出版了《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up>[2]</sup>一书，在此书中，他提出了不可能性定理。阿罗用数学推理得出这样的论断：如果由两个以上偏好不同的人来进行选择，而被选择的政策也是超过两个，那么就不可能做出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的决定。因此，在每个社会成员对一切可能的社会经济结构各有其特定的偏好序列的情况下，要找出一个在逻辑上不与个人偏好序列相矛盾的全社会的偏好序列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每个人追求自己的最佳偏好，而社会又提供了足够充分的选项的假设前提下，政治投票得不出一个符合每个人的意愿，也即真正民主的决策。但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通过其价值限制理论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通过使社会选择程序更具信息敏感性，也即如果有人愿意做出次优选择，这些问题能在多数情况下得到解决。<sup>[3]</sup>但我们可以看出，阿玛蒂亚·森已经修改了阿罗的前提，他实际上暗示人应当拥有包容性的价值观，不应执著地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他认为“在使自由和自主权利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相一致的过程中，相互包容的偏好与选择是至关重要的”。<sup>[4]</sup>这也可以说是易的一种体现，是利他主义和理性主义中的相对收益思维结合的产物。

---

[1] [美]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2] [美] 肯尼斯·阿罗：《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钱晓敏等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印度] 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印度] 阿玛蒂亚·森：《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胡的的、胡毓达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

[4] [印度] 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页。

## 结语

我理解的侨易学是在互动与接触（无论是物质位移，还是精神位移）的基础上，实现自我思想的升华，它不排斥自利，但同时又在交流和反思中懂得自我约束，对内和在在外都产生更清楚的认知。在政治学的体系中，侨易学应该归属政治心理学的范畴，在国际关系理论里，它与建构主义最为接近。它既有传统中国思想的影子，强调势与度，决策者应当顺时、顺势、顺力而动，在不同情境下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政策；又符合全球化时代人与人、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交往频度和密度大为增加的时代背景，集中关注这种接触、交流、交易所带来的决策者的心理和思想变动，所以说兼具世界性和中国特色于一身。侨易学与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从其他学科切入国际政治研究（前者为文学和学术交流史，后者为哲学），都有理想和规范色彩，也都局部借助了中国的传统资源，但它们之间也有区别：天下体系的规范性更强，它是在为世界语境中，为适合世界问题的广度而创造的世界尺度，<sup>[1]</sup>是对一种好社会的宏大设想，而侨易学更具现实的骨感，它不是宏观的结构论，而是从微观的个体入手，推演由侨致易的进程，其逻辑是政治进程中的人的思维的改变将影响组织、国家乃至国际政治的决策结果，而决策者思维的改变是通过物质位移或精神位移，与他人交往中实现的。

---

[1]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